

一部别具特色的诚信思想研究专著

——《唐代诚信思想研究》评介

惠 萍

(河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1)

【摘 要】 诚信观念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基石,也是构成我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要素之一。目前,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综合国力的增长,诚信观念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唐代是我国封建时代较为昌盛的时期,也是一个诚信思想大发展的时期,研究该时期的诚信观念对我国当前诚信文化建设有着特别的借鉴意义。苏士梅博士的学术专著《唐代诚信思想研究》紧密结合唐代发展史,对唐代诚信思想进行了一次从“庙堂”到“民间”的全方位考察。这本别具特色的诚信思想研究专著,是基于社会文化视角对唐代诚信思想进行全面研究的初次尝试,为我们今天构建诚信文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 诚信;诚信文化;《唐代诚信思想研究》

【中图分类号】 B2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040(2013)02-0108-03

诚信观念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基石,也是构成我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要素之一。自先秦至今,无论是在实践层面还是观念的提出与倡导,历代统治者和学人先哲都对该问题给予了不同程度的重视和关注。就思想史研究的层面而言,大体可按诚信思想在实际生活中昭显的路径和领域来考察,即从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三个大的方面来考察。目前,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和综合国力的增长,我国国际地位进一步得到提升,人们全方位、多层次的国际国内交往愈加频繁,诚信观念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唐代是我国封建时代较为昌盛的时期,也是一个诚信思想大发展的时期,研究该时期的诚信思想对我国当前诚信文化建设有着特别的借鉴意义。较之前贤时学对先秦时期诚信思想的研究,目前对唐代诚信思想的研究整体比较薄弱,且现有研究成果大都从政治诚信或伦理学、经济学、法学等角度切入研究,较为零散不系统。有鉴于此,

苏士梅博士的学术专著《唐代诚信思想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3月出版)另辟蹊径,紧密结合唐代发展史,对唐代诚信思想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综合考察——从“庙堂”到“民间”——既考察帝王将相的诚信思想及其践行,也考察诚信思想在普通百姓生活中的作用,涵盖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文化生活及民族关系等各个领域。这本别具特色的诚信思想研究专著是基于社会文化视角对唐代诚信思想进行全面研究的初次尝试,为我们今天构建诚信文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笔者深受启发,愿略述一二求教于方家。

一、从“庙堂”到“民间”： 基于社会文化视角的全面考察

唐代之所以成为封建盛世之一,文化繁荣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诚信思想是唐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唐代诚信思想研究》在梳理唐前诚信思想发展的基础上分别探讨了唐代社会

【收稿日期】 2013-01-07

【作者简介】 惠 萍(1974—),女,河南社旗人,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文学、新闻传播、编辑出版研究。

诚信思想的发展、唐代政治生活中的诚信、唐代经济生活中的诚信、唐代士大夫群体的诚信交往,以及唐代民族关系与诚信等几个方面的内容,作者指出:“诚信不仅是当时人们迫切关注的一个重要的伦理道德问题,它还是一个非比寻常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48]作者最后总结出唐代诚信思想的四个特点,即政治诚信突出、经济诚信彰显、民族诚信凸现、社会诚信风气浓厚。正如作者指出的那样,唐代社会的诚信思想是非常丰富的,上自皇帝、王公大臣、一般官僚士大夫,下至隐士、百姓等不乏倡导诚信和躬行诚信者,所以要“描摹”这样一个盛世的“诚信思想”委实不易,然而作者却颇费心思,“上穷碧落下黄泉”,在广泛占有材料的基础上从上到下、从内到外、从婚姻契约到墓志铭的撰刻再到飞钱的使用,有条不紊地展开论述,得出自己独特的结论,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唐代诚信思想全景图,在研究材料的取舍上显现出既能点面结合,又能另辟蹊径的特征。

作者认为唐代诚信思想是富有时代特点的,其发展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既与中国传统的治世思想有关,也与唐代社会历史发展的时代要求相连,还与唐代统治阶层(包括帝王和官僚)的整体素质有关,因此作者爬梳经典古籍文献,对唐代帝王、政治家、思想家、文人学士等所谓“庙堂”之上人群的诚信思想和行为进行总结,并结合今人论述作出了客观理性的判断。虽然诚信在唐代已经发展成为一种道德规范和社会风气,但现在考察唐代民间的诚信思想和行为却不是那么便利,因为民间诚信思想和行为很少见于经书典籍。作者的聪明在于另辟蹊径,从诗文创作(当然也有“庙堂”之上的文人士大夫创作)、婚姻契约、人死后的墓志铭、民间信用货币——飞钱的使用等,来勾勒出一幅生动形象的民间社会诚信画卷。“庙堂”与“民间”材料的取用,使得本书既有史学的严谨又不乏细节描述的生动。

二、诚信是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原则

《唐代诚信思想研究》在探讨诚信思想如何在唐代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文化生活中发挥作用的同时,也专门探讨了诚信在处理唐代民族矛盾过程中的辩证关系,角度颇为新颖。作者认为唐朝在处理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关系的实践中逐渐摸索出了“以诚信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原则,恩威并用是其大致方针,堪称后世处理类似民族问

题的典范。如“以诚信驭夷狄”、“以信臣驭边”、“和亲”、“结盟”等。与此同时,作者并没有停留在对此问题的简单陈述上,而对“有时无诚信成为唐人谴责和攻打夷狄的重要借口”的客观事实也一分为二地进行了深入分析和论述,最后得出自己的结论:唐代诚信思想在处理民族关系上的表现较为突出,但说到底,讲诚信只是唐王朝巩固政权的一种手段,其实质还在于用权谋而制四夷。“以诚信驭夷狄是唐王朝所采取的一种手段,带有一定的欺骗性和虚伪的成分。唐朝与少数民族政权的结盟虽是一种示信的行为,同时也说明,唐与这些民族政权之间实际上已互不信任”。^{[1]250-251}

三、诚信文化的构建是一项系统工程

无论怎样高度评价《唐代诚信思想研究》对帝王诚信思想,对政治家、思想家、文人学士诚信思想的论述都不为过,但该书的学术价值更多地体现在客观翔实地描述了作为一种文化的诚信思想在唐代社会生活中的践行情况,即“庙堂”与“民间”诚信生活的互动。《唐代诚信思想研究》一书明确告诉我们诚信文化的构建是一项系统工程。

首先,“领导提倡、上行下效”。作者指出在唐朝前期和盛唐时期,帝王多能够励精图治,以百姓为念,知人善任,勇于纳谏,且能够以诚信执政,如唐太宗、武则天和唐玄宗都是对诚信作用有着深刻认识的英明君主。“上行下效”,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大批竭诚为国、诚信为民的执政大臣,如魏征、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等。唐代诚信思想的发展,与唐代统治者的倡导与践诺密不可分。

其次,意识“形态化”(这是套用术语的一种表述)。任何时候,要构建诚信文化大厦,都需要从思想家宣扬或者知识分子发挥知识建构功能,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共识做起。比如唐代士大夫在诗文创作中展现出的对诚信的渴望与推崇,就是意识形态化之后的诚信思想的“外化”。同样,人死后在墓志铭中还在意诚信的“躬行”与否,说明诚信理念已深入人们的心灵深处,积淀成为一种社会心理。

再次,要有法律制度保障。如果要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崇尚诚信文化的风气,仅仅靠领导者倡导、思想家(知识分子)宣扬还是不够的。现实生活问题千差万别,每个人(包括不同集团)不同时期的利益诉求各不相同,当个体与个体、个体与集

团、集团与集团等的利益诉求冲突时,必然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矛盾。诚信不能单靠道德理念和社会自觉来实现。因此,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从法律制度层面来约束。唐代的监察制度、契约制度、典当制度、婚姻契约等对形成唐代诚信文化的社会风气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这些都是可供借鉴的资源。

诚信文化的建构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善的,要靠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努力、积极实现。要解决诚信问题,使整个社会形成良好的诚信风气,还有待于发挥文化的作用。“文化决定诚信,是诚信之源。有什么样的诚信文化,就有什么样的社会诚信状态”。^[2]

四、余论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探讨“唐代社会诚信思想的发展”一章除了专门探讨帝王的诚信思想外,还探讨了政治家的诚信思想、思想家的诚信思想、文人学士的诚信思想,这种以身份划分的论述是否稳妥可以商榷。不管成功与否,帝王本身就是封建时代最大的政治家,政治家同时也可以思想家,而封建时代的文人学士又何尝不可以是政治家、思想家?其实,作者在文中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比如“唐代社会诚信思想的发展也与唐代士大夫关系密切,因为承载诚信思想和道德品质的唐代士大夫,又兼官僚身份于一身,唐代的诚信思想能够借助于这些官僚士大夫的力量得以很好地推行”。^{[1]255}但是作者尚未找到一种合适的表述,可以把不管是帝王将相还是文人学士、不管是政治家还是思想家的诚信思想都可归到这里来探

讨,从而使分类更为妥当。还有,“士大夫群体”与“文人学士”的划分也存在类似问题。应该说为了从理论倡导和实践躬行这两个层面来研究唐代的诚信思想而这样划分,仅仅是一种权宜之举,对我们实际理解并不构成大的障碍,但可引发我们进一步思考。

另外,本书没有把“诚信文化的建构”设置成一个单独的问题进行专门讨论,只是在论述其他问题时顺便提及,从而使得这一核心问题在文中的重要性大大弱化,笔者觉得有些可惜。但瑕不掩瑜,《唐代诚信思想研究》开创的社会文化视角,从“庙堂”到“民间”的全景叙述,足以让学术界耳目一新。

其实,弘扬诚信文化,诚信不是目的,而是协调社会总体秩序的一种手段,目的是为了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以利于国家、民族和个体的安定与幸福。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在全社会“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号召党员、干部做“诚信风尚的引领者”,以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等,都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唐代诚信思想研究》一书的现实意义也正在这里。

[参 考 文 献]

[1] 苏士梅. 唐代诚信思想研究[M].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

[2] 孙雅南. 诚信文化的哲学思考[J]. 中州学刊,2012,(2).

(责任编辑 李逢超)